

经典

# 伊凡·克里玛：在内心打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高 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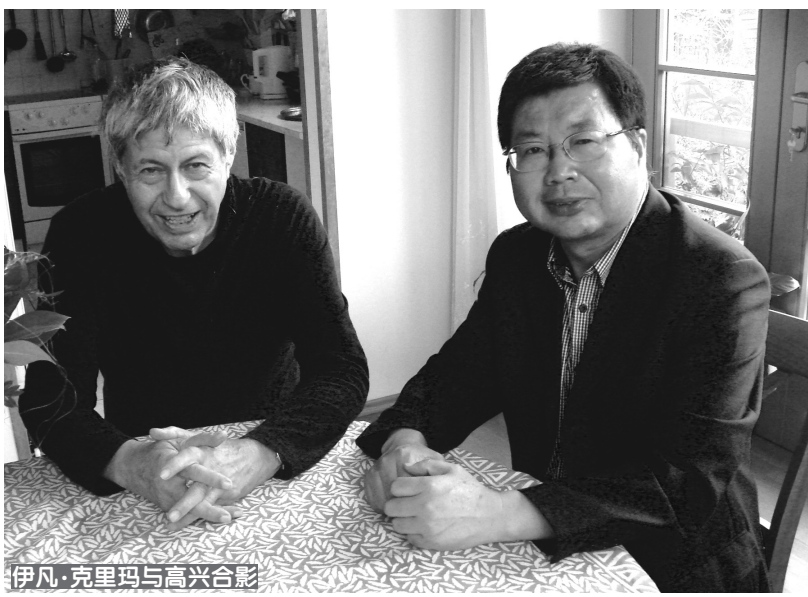
几年前,我曾在布拉格一个9月金色的午后前去拜访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当时,他已年届80,但精神矍铄,始终笑盈盈的样子,格外和蔼亲切。在他宽敞的别墅里,我们的交谈流畅而愉快。星架和我主编的克里玛系列作品就放在书架显著的位置上,他说能面向中国读者,对自己意义重大。

尽管历经坎坷,但无论为人还是作文,克里玛总是那么平静。他说:“平静能保护自己的心境。捷克上世纪50年代最为糟糕,其他时候,生存都没问题。我完全可以定居国外,最终还是坚持留在了祖国。这里,我用母语写作,自如而舒服,而且生活在亲人朋友中。政治高压时期,我一无所有,但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写作。”如此,从一开始,写作于他,就成为一种呼吸、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我拯救、一种抗衡灰暗的武器。

提起捷克当代文学,人们往往都会首先想到米兰·昆德拉。阴差阳错,在世界各地无数读者的心目中,昆德拉已然成为整个捷克文学的代表。有趣的是,一些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捷克人对此却颇不以为然。许多捷克评论家和作家甚至已不承认昆德拉是捷克作家。实际上,昆德拉本人也早就把自己当作法国作家并直接用法语写作了。这里面自然涉及到不少文学及文学以外的因素,比如,特殊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尊、更为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等等。而捷克人最为推崇和喜爱的是几个“始终没有缺席的”作家,克里玛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克里玛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曾有3年多时间的集中营经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同200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克里玛对集中营经历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他认为,除去恐怖,那段极端的经历还给他带来了幸福和自由的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甚至觉得:“为了一种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自由的感觉,所有那么多年的剥夺是值得的。”正是在集中营里,他首次听从了写作的召唤:“当我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一一死去时,我却幸存了下来。这时,我被一种类似于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去变成他们的叫喊,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世上抹去的死亡的叫喊。”这样的出发点实际上很容易让人走向偏激和狭隘。但令人惊奇的是,在克里玛的作品中,却几乎看不到“仇恨”两字,因为,克里玛及时领悟到,极端的经历并不能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只有和自身的经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这种开悟在将他的创作引向一种更高境界的同时,也激活了他内心源源不断的创作力。在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已出版了《我的初恋》《我的金饭碗》《爱情和垃圾》《风流的夏天》《被审判的法官》《一日情人》《爱情对话》《绝对亲昵》等几十部长篇小



伊凡·克里玛与高兴合影

说和短篇小说集。此外,还写下不少剧本以及《布拉格精神》《在安全和不安全之间》《我疯狂的世纪》等随笔集和回忆录。尽管“布拉格之春”后,克里玛的作品在捷克遭禁,他本人也迫于生计,当过急救站护理人员、土地测量员、小商贩等等,但他的大量作品依然以地下读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不少还传到了海外。因而,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重返捷克文坛时,实际上已是一位在国际文坛上享有声誉的作家了,作品被译介到了50多个国家。只不过当时,昆德拉正在中国迅猛走红,读者对其他捷克作家视而不见。而欧美文学评论界早就将克里玛和移居法国的昆德拉、当上总统的哈维尔以及已经故世的赫拉巴尔相提并论。

但同这几位同胞作家相比,克里玛走的显然是另一种路子。他不像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像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显然更看重质朴和自然,要在质朴和自然中贴近世界、生活和人性的本质。

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耐读,是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宁静。如果说昆德拉总是要突显自己的话,克里玛正好相反,总是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昆德拉总是不断地从小说背后跳出来,打断读者并引领读者去沉思、去发问,自觉地扮演起导师的角色。这可能也是他每每读到昆德拉,就会首先感到他的骄傲、他的炫耀、甚至他的自私的缘故。昆德拉是个文学野心很大的作家,他的确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文学成就。而克里玛却要谦卑得多,只诚实地给你讲几个故事或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你自己去回味、去琢磨。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琢磨、可回味的,他也就一点也不在意。他能从那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

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找快乐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昆德拉就时时担心自己的民族随时会灭亡;克里玛正相反,他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应付生存的超级本领。读读哈谢克,认识一下那个胖乎乎的帅克,你就会同意克里玛的看法。他在谈到布拉格这个城市更愿意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时,也正是他在谈论捷克这个民族。

克里玛的作品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在这点上,他和昆德拉有着相同的策略。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情欲与死亡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理解了这两个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克里玛的小说,也更容易理解捷克民族。

《我的初恋》和《一日情人》都是克里玛本人特别钟爱的作品。他觉得,写短篇小说更有愉悦感。得知我翻译过《我的初恋》,他连忙问我喜欢哪几篇。《米里亚姆》和《真话游戏》,我回答。他说《我的初恋》和《一日情人》中的许多短篇都是他生命中真实的故事。《米里亚姆》中的初恋故事就发生在集中营,当人处于饥饿状态时,食品便最重要,而一个能多给你一块面包的姑娘,你肯定会爱上她的,初恋就这样同饥饿连接在了一起。故乡、少年、青春期心理、女人、真实和虚幻、情爱和爱情,这些人生中的重要主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学艺术中的重要主题。它们常常杂糅于一体,彼此纠缠,有时又相互矛盾,以迷人却又难解的方式,构成人生的交响。人生常常没有答案,你可别试图从这些故事中去寻找答案,克里玛轻声地提醒。没有答案,却有了小说,这就是克里玛,这就是克里玛风格。许多小说家认为,小说仅仅提出问题并讨论,并不提供答案。克里玛更加干脆:提出问题后,连讨论都显得多余。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人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表面上“原封不动”,实际上却有着对人生最精情的敏锐和最深刻的感悟。他的那些有关爱情、婚姻、良知、忠诚和背叛、灵与肉等等主题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

那天下午,光线在不知不觉中移动,我们谈了3个多小时。拍照时望着微笑的克里玛,我想起他说的一句话:“摆脱仇恨,你便能在内心打开一条通往幸福的路。”

人的心理是一个值得开垦的广阔领域。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说:“人心并不是平静的池塘,并不是牧歌式的林间湖泊。它是一片海洋,里面藏有海底植物和可怕的居民。”斯蒂芬·茨威格就是这片心灵海洋的不知疲倦的勇敢探险者。他认为:“内心的无限,灵魂的宇宙还为艺术打开了取之不尽的领域。对灵魂地发现,对自我的认识,将成为我们——变得智慧的人类——将来越来越大胆地破解又无法最终解开的课题。”他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类心理活动的奥秘,热衷于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其中弗洛伊德学说对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弗洛伊德是茨威格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茨威格十分推崇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认为它向人们指出了进入人的灵魂、探索人的深层心理之路。而茨威格的小说最引人注目的主题,一是对潜意识的揭示和对女性心理的出色描绘,二是对青少年青春期心理的关注。

茨威格的小说绝大多数都写到激情的遭遇,带有深深的精神分析印记。在他的笔下,激情就是潜意识中的原始欲望,也就是本能冲动,是潜意识中释放出来的“力必多”。茨威格喜欢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去发掘最隐秘的角落。他的心理分析小说像是精确的心电图,记录着主人公心灵颤动的曲线。小说主人公大多抵抗不住命运摆布,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本能冲动对主人公行为方式的支配作用,及其对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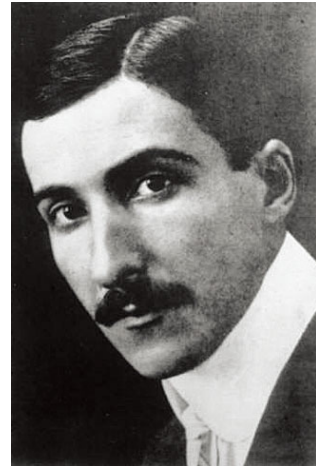
茨威格善于洞察和表现女性内心活动,在塑造女性形象、揭示女性心理方面堪称独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最典型地呈现出了作家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弗洛伊德的影响也最为明显。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那位陌生女子身上所焕发出的激情,就是本我或潜意识中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和冲动。女主人公的信写得缠绵悱恻,袒露了一个女子最隐秘的心理活动。《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中,女主人公C夫人在情欲的驱使下,对赌徒的一时委身转变为真诚的愛,谁知她的无私奉献换来的却是赌徒的辱骂。这24小时的经历如梦魇一样压在她的心头,使她的后半生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小说对潜意识心理的描写令人叹为观止。高尔基认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比茨威格的其他中短篇“更见匠心”,并称茨威格是“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来描写妇女”。《恐惧》也以引人入胜的心理描写著称。女主人公伊蕾娜红杏出墙,遭人跟踪和敲诈,精神濒于崩溃,最后丈夫原谅了她,对她更加温柔体贴。评论家称,茨威格“对女性心理的分析,已经近乎走火入魔”。在茨威格的一些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同样也有瞬间爆发的激情遭遇,《森林上空的那颗星》中,那位饭店跑堂的卧轨殉情就是一例。《象棋的故事》中的B博士在下棋过程中下意识哆嗦的双手和忘我的神情就是身上激情瞬间被激发出来的表现。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耽于某种思想的偏执狂,茨威格坦言:“我平生对患有各种偏执狂的人,一个心眼儿到底的人最感兴趣,因为一个人知识面越是有有限,他离无限就越近;正是那些表面上看来对世界不闻不问的人,在用他们的特殊材料像蚂蚁一样建造一个奇特的、独一无二的微缩世界。”(《象棋的故事》)

关注青少年青春前期和青春期的心理,是茨威格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主题。青春期的心理最为敏感,对成人世界,尤其是对两性关系怀着恐惧、羞涩与好奇。《朦胧夜》《家庭女教师》和《夏天的故事》等描写的都是青少年青春萌发的内心情感和生理的变化。在世界文学史上,像茨威格这样对青少年青春期的心理给予那么大大关注的作家并不多见。茨威格这一题材的小说大多写于上世纪20年代以前,这恐怕与当时奥地利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奥地利,人们都小心翼翼地回避性的问题,认为它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有悖于当时的伦理道德。青年男女很少有无拘无束的真诚关系,他们的正常交往也受到社会道德规范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茨威格对青春前期青少年心理所作的细致入微的研究和真实生动的描绘就显得尤为可贵。

茨威格始终坚持人道主义理想,对人,特别是对“小人物”、弱者、妇女,以及心灵上备受痛苦煎熬的人给予同情和爱心,对主人公的遭遇和不幸、对他们人性的缺点与弱点给予真诚的谅解和宽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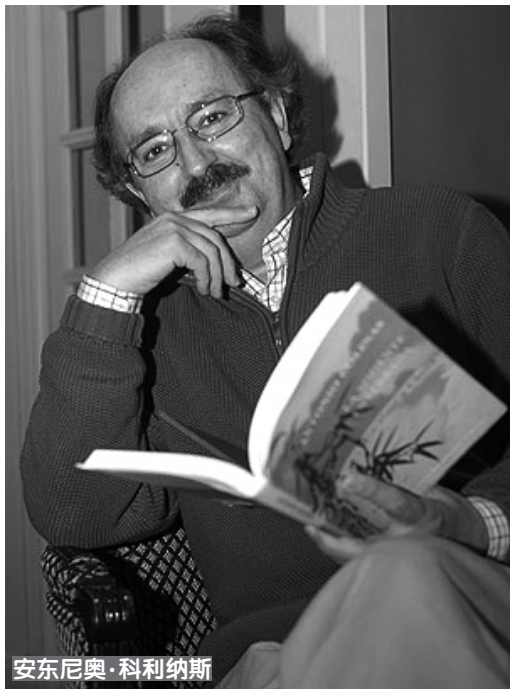
# 斯蒂芬·茨威格：心灵海洋的探险者

□韩耀成



斯蒂芬·茨威格

伊比利亚诗选



安东尼奥·科利纳斯

安东尼奥·科利纳斯(Antonio Colinas),生于1946年,是目前西班牙诗坛颇有影响并十分活跃的诗人,曾访问中国。主要作品有《土地与血的诗篇》《整夜序曲》《宙宇中的雷声与笛声》《塔吉尼亚的坟墓》《星盘》《夜外之夜》《野葡萄》《俄耳甫斯的花园》《敞开的夜的书》《火的寂静》等。

安东尼奥·科利纳斯(Antonio Colinas)1946年出生于西班牙北部城市莱昂,15岁时来到南部古城科尔多巴,在那里的3年,南方的风土为他带来一次重生,新的词语迸发,展现给他观察世界的全新方式。此后他前往马德里求学,1969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故土与鲜血的诗》,1982年凭借《诗集》(1967-1980)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除了创作诗歌,科利纳斯还是两位伟大的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和夸西莫多的西班牙语译者,2005年他翻译的夸西莫多全集获意大利政府颁发的国家翻译奖。在伊比萨岛度过20载

# 安东尼奥·科利纳斯：天地旅人

□汪天艾

瓦利斯恰是在一个富于星辰和萤火虫的夜晚出现——“历经多年,我在你蓝色的火焰里,/在你栗树与松树的密林里认出你。/我认出你,在大吠的暴怒里,/在幽暗中长出的湿漉漉的草。/我猜,你挂满瀑布与葡萄藤。”诗中“最甜蜜的夜晚”代表了一个独一无二而超验的时刻,最后庄严作结“只是我还得回到/人类的世界,就任一颗星坠落,/钉一支燃烧的鱼叉在我悲伤的双眼之间,/或者让我统治你,像一轮月亮”。

另一首有趣的阅读体验诗更是与身体之旅相连。1971年5月,科利纳斯在威尼斯拜访了当时自美国精神病院出院定居意大利的诗人庞德,归来后记下《遇见埃兹拉·庞德》。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围墙泛着病态的玫瑰红,花园被阴影浸染,在去找庞德的路上,“你将忘记大海在你背后吞陷/小岛,教堂,宫殿,/世上最美的穹顶,/别迷上大海或人鱼”。他前去询问那个男人住在哪里,“一个有点点的美国人,/高个,络腮胡白雪皑皑”。根据别人的指点,诗人继续向前,穿过石桥,运河里浮满柑橘花和腐烂水果,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声传来,他噤声张望,终于找到“拉莫·科尔特·克里纳”这个路名,那是一条摆着花盆的窄巷,诗人在最后一行按捺前情里的辗转找寻,直铺一句“那里住着埃兹拉·庞德”。诺瓦利斯和庞德是两个诗歌时代的象征,而科利纳斯对他们怀有同等的崇敬,因为在他看来,诗人的目光应该是全球化的,关心的是整体生存的大命题。诗人的职责在于对那些永恒的命运用自己全新而独特的声音给出答案。这种全球化的目光可以抵消一直以来古典主义与先锋主义的对立——“古典与先锋并非互相否定,像庞德这样现代主义的诗人同样也不断寻求古典源泉”。

在科利纳斯的诗学观点中,诗歌首先是一条通向认知的路径,可借以解读和彰显现实。不仅是我们身边真实可见、切实可感的现实,也包括不可见却始终存在的“第二现实”。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对浩瀚时空中微缩的历史影像有格外的偏爱。例如在刻画战争这一动播20世纪知识分子信仰体系的大历史时,科利纳斯置身战后异国火车站站台上的一位旅人,大雨滂沱的夜晚,“上次战争的废墟还钉在我脸上”,铁轨的尽头通向墓地,而“土里埋的,是身体,又或者仅仅是雪”。诗中所谓“一个北方的车站,一个流徙者经历

的夜晚,然而他知道“别的地方也是夜晚”,知道这场雨也下在“世界每一双青铜的手上”,下在这个时代人类间咬碎的每一块玻璃上”。直到诗末,广袤的气息“在高压线上/弹出痛苦与死亡的琶音”,个人伤痛与历史伤痛交织成一首哀歌,弹出断弦的凄音。从微缩历史到微缩宇宙,一首《走吧,走吧,我们去欧洲》成为科利纳斯“微缩宇宙”诗歌的代表作。整首诗以“于是我们说:走吧,走吧,我们去欧洲”开始引导一场欧洲文化历史之旅,一行一个故事,一行一个国家,加尔文的内瓦瓦有石头垒起的咖啡馆,尼采在西尔森的森林疯狂散步,雨在巴黎的布洛涅森林落下,锡耶纳有童女的鬚发、橄榄一样的嘴唇。时光倒退回公元前79年,维苏威火山脚下“庞贝的妓院里/木兰伴着夜晚升起”,如果还要再继续,那么加快脚步,“我们还赶得上/碰触希腊夜晚的胸膛”。诗人将不同的时间空间叠加,以连续的冲动波构成非理智的诗句流,试图用每一股冲动表达一个世界。

科利纳斯的创作生涯始终在读一本“自然之书”,如他自己所言:“自然是诗歌创作的中心主题,自然是万物的本源,发于斯,归于斯。”在出生、转变、回归的过程中,诗人得以用象征的目光审视世界,并相信有时只有象征可以解释不可解释之物,从而阐明生命的奥秘。在他的诗歌中,象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形成象征串的循环,也构成了科利纳斯对中国道家思想的阅读中悟出的“宇宙神秘之道与周期往复的变迁”。中晚年的科利纳斯继续将凝神的目光放进大自然中,加之对东方思想文化由来已久的兴趣,他的诗歌进一步呈现“温顺诗学”的特质,中庸而平和。这一点在他1997年出版的《温顺之书》中可见一斑。其中,《假如有一天飓风来到你们的生命》是诗人写给孩子们的诗,诗中他指引子女从大自然中获得平静,“在北方,就在颤动的杨树荫下,/在南方,就在柑橘树的轻风里;/想想飓风怎样吹过/灯心草,灯心草并不变色,/也不遭害,因为灯心草柔软”。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遇到生命的飓风时,保持心灵的清明,呼吸的平和,“平静地在它的暴怒中呼吸,深深地呼吸,/然后等待,/此时,要比以往/都更柔软,/做灯心草,香气,光”。这种在自然里寻找参照、以柔克刚的生命哲学给予科利纳斯的诗歌特殊的力量。

通过道家思想,科利纳斯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新千年伊始,他曾受邀来到中国访问,回国后在2005年出版了散文随笔集《深埋的种子——中国纪》,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之中,科利纳斯发现了属于一个崭新时代的迹象,看到一颗深埋的种子即将破土而出,将过往的智慧与现实的发展融合。对科利纳斯而言,中国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不仅能读懂这个国家,更能读懂整个人类。

## 二十世纪

□安东尼奥·科利纳斯  
汪天艾 译

这里,异国的车站,这个二十世纪的夜晚,上次战争的废墟还钉在我脸上。远处,火车,绝望地拉响汽笛,我独自站在大内瓦瓦。痛苦在我体内破开通道像一股眩晕,或者一块巨大的灼痕,在这个水状的、病态的世界。孤独拖拽我,透过长满尖刺的宇宙啣弄我。我知道别的地方也是夜晚,风会摇动路边开花的刺槐,路的尽头通向墓地,电光照亮塑料的黑花,被一只焦躁母狗砸死的眼晴,土里埋的,是身体,又或者仅仅是雪。雨强劲地下,我的心是荒凉,通电的站台,在这北方的车站。下雨,雨下在世界每一双青铜的手上,在所有的水泥肌肉里,在墙上排出的嘴唇里,在这个时代人类间咬碎的每一块玻璃上。而潮湿的风吞噬最后一辆火车的汽笛,火车在远山后面看见更疲惫的破晓,腐败的光。这潮湿的风带来的腐臭(燃烧的幕布和垃圾桶)高高地,在高压线上弹出痛苦与死亡的琶音。